

知青經歷和一代人的價值取向

丁東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新一屆領導人在中國大陸政壇上台。主要領導人的知青經歷及其內心深處的「知青情結」，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國內媒體上迅即出現了各種評論，如秦曉鷹發表了多篇討論「知青情結」的文章。其中，他在《瞭望中國》雜誌上撰文論述中共新領導人的「知青情結」如何培育了他們的「底層情結」^①：

在新當選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有多人曾經置身過上世紀60年代末那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潮流中。在七位「入常」人士裏，就有四人曾經是「知識青年」，他們是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王岐山。

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就是一個社會管理者的意識形態。依照此理推論，可以設想，如果在中國執政黨的最高決策層（即領導集體）存在這樣一批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領導人，就不難想見，無論歲月如何變幻，在人的世界觀形成階段中留下的「底層」情結，必然要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他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也就會或隱或顯地影響到一系列的政策走向，甚至未來中國的社會發展。生活造成的這種精神烙印，會在這些社會管理者做決策時產生強有力的心理暗示。

在那個動蕩的「文革」年代，年輕的他們曾在中國的底層看到過一個最真實的中國：嚴重的貧困、極度的落後，以及生活在這種低劣的物質與精神狀況中的億萬父老鄉親。黑土地黃土地紅土地上存在的一切悲情與悲劇，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錐刺般的、終生難忘的震撼。這種震撼經過思考和沉澱，形成了他們承認現實、尊重實踐的素養；形成了他們不受種種虛幻、空洞、華麗詞藻和假革命的誑騙，能獨立地思考問題，尋找矛盾的真實癥結的思維特點。當然也形成了他們講話中較少官腔、較少學生腔、較少八股腔的特色。

中共十八大以後，新一屆領導人在中國大陸政壇上台。主要領導人的知青經歷及其內心深處的「知青情結」，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國內媒體上迅即出現了各種評論，論述中共新領導人的「知青情結」如何培育了他們的「底層情結」。

海外自由撰稿者姜維平也宣稱「從習開始，中國進入知青時代」，而這篇網文在中國大陸的諸多網站上均可搜到。他寫道^②：

以習近平接班為標誌，中國進入了知青時代……在已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裏，有許多當年的知識青年，在常委裏，一二號人物都是知青……由於他們的特殊經歷，習近平和李克強，非常了解下情，這種了解不是有意而為，而是命運使然，比如，習近平去延安插隊，與農民打成一片，後來上學回京，是原先始料不及的，他父親習仲勳的文字獄，他自己的兩次被監禁，他在鄉下與窮人同甘共苦，都刻骨銘心，這些都給他留下深刻的烙印，這也促成了他獨特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新的中共高層領導將來會如何動作，取決於形勢，而非文件，他們必將藉機而變，因為誰也不會預見明天會發生甚麼狀況，一旦突發事件出現，在危機時刻，就會看出歷史人物的作用，而習李如何應對，不會求助於僵化的文字，而會來自於知青情結。

對於中共新領導人知青經歷的影響，海內海外，議論紛紛，讚揚有之，期待有之，擔心有之，質疑有之。筆者認為，中國領導人的知青經歷與未來中國政壇的走向存在內在關聯，是一個無須懷疑的事實。

首先，他們與窮人有過血脈聯繫，與階級鬥爭的社會有過衝突，因此，相信其所思所想會站在人民的一邊，並有意民主與法制建設……其次，這一代知青的精英又大都從鄉下進入校園，不僅體察民情，而且學識淵博，眼界開闊，因此，如遇社會危機，會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國，靈活應對；第三，知青吃苦耐勞，作風扎實……

同時指出：

中國經濟形勢較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雖兩極分化嚴重，但大多數人希望社會穩定，既求變革，又望平安，故心情矛盾，瞻前顧後，人們大都希望改良，而摒棄革命，所以，他們[新一代領導人]可能守成為要，變革為次；就他們自身來說，由鄉下回城讀書而進入體制，豐衣足食，地位顯赫，也擔心一切得而復失，因此，也有保守和安於現狀的一面……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也撰文指出^③：

這一代中共的政治精英，與其前一代，有明顯「代溝」。具體而言，他們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同時絕大多數曾是「知青」，曾墜入社會底層，對底層冷暖，有親身體驗，不會麻木不仁。

更重要的是，文革的戲劇性經歷對他們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在文革中，由於基本生存本能的驅使，由於對文革前十七年來自身社會地位和利益的準確直覺，在實際的各組織和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角逐中，在極其險惡的情勢下，人們對政治領悟極快，進展神速……文革在這個意義上培養了中國的一代政客 (politician)。他們的主要特點是精神與行動都束縛較少，

敢於行動，敢於出手。其基本問題在於忽視基本政治倫理，蔑視傳統道德底線，基本不問原則，不擇手段，不受約束，信奉「叢林法則」，信奉唯權力主義。

文革之後，他們進入中共官場歷練。中國極其險惡的官場生態，三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的大起大落，驚濤駭浪，與經濟領域的超強互動關係，同時又有與毛時代不同的大量國際交往，使其增添了一份對現代政治的感悟。於是，文革經驗與改革時代經驗的交互作用，使這一代中國政客在其政治行為方式和理念上，與其前輩很不相同……無論如何，與前代政客比較，他們顯然不那麼謹小慎微，瞻前顧後。這些政客，倘若繼續實施暴政，勢必心黑手辣，周天寒徹；倘若真正確立了革故鼎新的信念，也就可能大刀闊斧，拼命向前。

總而言之，對於中共新領導人知青經歷的影響，海內海外，議論紛紛，讚揚有之，期待有之，擔心有之，質疑有之，限於篇幅，筆者只能列舉有限的幾種。筆者認為，中國領導人的知青經歷與未來中國政壇的走向存在內在關聯，是一個無須懷疑的事實。研究知青底層體驗對一代人價值觀的影響，既是一個歷史學課題，也是一個政治學課題。

自建國以來，先後由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主政。因為華國鋒主政時間較短，人們習慣於把毛、鄧、江、胡、習稱為五代領導人。這五代領導人中，本人有過農民生活體驗的，只有第一代和第五代。

二 關於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

「知青」是「知識青年」的簡稱。「知識青年」的概念在現代漢語中出現得比較早，而「知青」這一簡稱則定型於文革期間，特指上山下鄉的城鎮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的知青又分為兵團知青、農場知青和插隊知青。兵團和農場為國營企業，兵團和農場知青是掙工資的職工；而插隊知青是到農村生產隊落戶，和農民一樣掙工分。以下從插隊知青入手，討論知青和當代中國社會體制的關係。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先後由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主政。因為華國鋒主政時間較短，人們習慣於把毛、鄧、江、胡、習稱為五代領導人。這五代領導人中，本人有過農民生活體驗的，只有第一代和第五代。

毛澤東是農民出身，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戰爭奪取政權。但他的施政卻給農民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後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農村原比城市貧困，但農民有向城市遷徙的自由，農民和市民之間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然而毛效法蘇聯的政治經濟模式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對農村先後實行農業產品的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與人民公社化，並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其實施的戶籍制度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又用壓低農產品價格的方式取得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剝奪了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使農民在教育、醫療、就業、社保、養老諸方面的實際待遇都大大低於市民。特別是大

躍進的失敗，造成了食品供應極度匱乏，1959到1962年以犧牲農民的方式保證城市的基本食品供應，使中國農民「非正常死亡」多達三千多萬。

毛的政策對農民造成了巨大傷害，但他卻極不情願受到批評。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言說：「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有九天，農民的生活有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④當即觸怒了毛，遭到了毛最嚴厲的反擊。從此不論黨內黨外，為農民鳴不平成為政治禁忌。

毛澤東選擇的民粹主義路徑，不是讓農村城市化，讓農民變成市民，把低的提上去，而是把高處的拉下來，讓一部分市民變成農民。動員城市知青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是這條民粹主義路徑的具體體現。

毛澤東也想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這是他社會主義理想的題中之義。但他選擇的民粹主義路徑，不是讓農村城市化，讓農民變成市民，把低的提上去，而是把高處的拉下來，讓一部分市民變成農民。動員城市知青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是這條民粹主義路徑的具體體現。早在1942年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就說：「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⑤當時他身體力行，送兒子毛岸英拜吳滿有為師學農。至於安排城市中學畢業學生上山下鄉務農，從1962年起就列入了國家計劃，萬里、陳伯達等高級幹部，曾在毛澤東思想的感召下，主動送中學畢業的兒子下鄉。當然，文革前下鄉的近130萬城市青年，絕大多數不是這類情況，而是由於家庭出身等政治歧視因素，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不得已到農村插隊。

到了1968年，政府為了緩解就業壓力，消弭經歷文革造反的中學生對城市秩序的干擾，大規模動員知青上山下鄉，而輿論動員的主旋律是靠理想主義感召。毛澤東1950年代說過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



1967至1969年間第一次下鄉潮掀起之時，北京學生經常在天安門舉行誓師大會。

的]成為最流行的口號^⑥。知青上山下鄉被描繪成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最佳途徑。其實，當時人們也很清楚，大學停止招生，中學畢業生最好的出路是參軍。當時軍人的社會地位很高，當兵經濟收入有保證，有提幹機會，復員可以回城分配工作。軍隊幹部掌握徵兵的權力，照顧適齡子女親朋參軍，在當時就是一種特權。但一般青年想當兵而不得。

為了突顯知青上山下鄉的意義，在文革期間，官方提拔了一部分知青進入領導崗位：當選中共中央委員的有老知青邢燕子，當選候補中央委員的有上海知青朱克家，當選四屆人大常委的有遼寧知青張鐵生，陝西知青孫立哲成為衛生部五人領導小組成員，還有擔任其他各級領導幹部的知青典型。中共以此來證明知青上山下鄉是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途徑。對於有政治抱負的青年來說，這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少數知青身上的光環，不能掩蓋多數知青的生活窘境。1973年，知青家長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知青生活苦況，得到毛澤東的回覆^⑦。及後毛的信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知青運動的真實處境展露無遺，但作為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又必須堅持，於是官方出台規定，每個城市家庭可以有一個子女留城，其餘一律下鄉。鍛煉兩年以上才可參軍、招工、升學。這雖然是一種強制性安排，但大體平等，就是華國鋒的女兒也要下鄉插隊。這種與其他國家強制服兵役相似的制度，使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持續到華國鋒主政的時代。

後來鄧小平在與華國鋒的政治博弈過程中，一度支持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敢於革故鼎新的政治家，他們先後恢復了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結束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取消了人民公社，停止了統購統銷，重新開啟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毛澤東給農民留下的沉重遺產，大部分送進了歷史博物館，只剩下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遲遲不能廢除，延續至今。

在江澤民、胡錦濤主政的二十多年間，進城務工的農民已經增長到兩億多人。「農民工」成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1.3%，但非農業戶籍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僅為34.7%^⑧。農民工戶口留在農村，到城市打工，卻無法在城市安家，在基本社會保險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社會救助項目、子女義務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不能享受和市民同等的待遇。他們作為廉價的勞動力，支撐了出口導向型經濟，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GDP躍居世界第二位，國家和社會強勢階層獲益極大，但農民工得不到起碼的平等待遇和尊重。

如果說江、胡兩代領導人因為自身沒有農民經歷，不能切身體察農民和農民工的疾苦，缺乏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緊迫感，那麼當過知青的新一屆領導人，就沒有推脫的理由了。他們曾經和農民一樣土裏刨食，對農民的處境感同身受。他們和當時的下放幹部、「老五屆」大學畢業生是不同的。老五屆也參加了文革，畢業後到工廠、農場部隊鍛煉，後來落實政策，回到專業技術崗位。他們一直掙工資，是體制內的幹部身份。而知青是農民身份，不是國家體制內的人。知青與農民的同感，是前幾代知識人所不具備的。習近平在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

如果說江、胡兩代領導人因為自身沒有農民經歷，不能切身體察農民和農民工的疾苦，缺乏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緊迫感，那麼當過知青的新一屆領導人，就沒有推脫的理由了。他們曾經和農民一樣土裏刨食，對農民的處境感同身受。

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⑩，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最迫切期盼這些的就是包括兩億多農民工在內的六億中國農民。筆者認為，已經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在知青一代領導人主政期間廢除，是他們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也是他們爭取民心的政治機遇。

三 知青的語言

知青一代成年以後趕上了改革開放，經歷了對文革的反思，目睹了蘇聯模式的破產和冷戰的終結，參與了中國在經濟領域和世界接軌的過程，感受了民主憲政成為人類文明不可抗拒的潮流。時代要求他們必須與時俱進，吸收新的政治理念。

新一屆領導人上台以後，想從改變作風、文風和會風入手，打造新的形象，提升人氣，挽回執政的合法性。從數月以來的言論看，他們對語言的選擇，與知青經歷也存在關聯。

有人注意到，在習近平的言論中，毛澤東的話語往往脫口而出，擔心這意味着毛時代價值的回歸。筆者認為，習慣於使用毛的語言，是知青這一代人的成長環境所決定的。毛不但是魅力型政治家，也是一位語言強人和氣質詩人。知青一代在文革前讀小學、中學，正是國門封閉、毛澤東思想統率一切的時代。當時人們讀的是毛主席著作，引的是毛主席語錄，吟的是毛主席詩詞，唱的是毛主席頌歌；就是吵架辯論，也以毛的言論為戰勝對方的根據。中國進入1960年代以後，古代和近代的文化傳統基本斷裂，外國的當代文化進不來，一切非毛的思想文化，幾乎都被打入「封、資、修」之列。知青一代，在自然科學方面營養不良，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都低於海峽對岸的同齡人。語言習慣一經在青少年時代養成，很難改變。少數知青堅持尋找毛以外的思想文化資源，但是風險巨大，而且難成體系。到了1980年代，國門開啟，這一代人已經人到中年，除了少數人以吸收和消化新知為業，有可能擺脫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烙印，對於多數人來說，很難與毛的影響切割。

對於政治家來說，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關鍵不是用不用毛澤東的語言，而是用毛澤東語言表達了甚麼樣的政治意圖。據筆者觀察，到目前為止，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當政者還是把鄧的政治遺產作為繼承的首選。

與知青經歷密切相關的還有農民語言。比如習近平引用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就是農民俗語。知青到農村後，發現操學生腔面對農村社會顯得很幼稚，有意學習農民語言，也是當時知青的風氣。由此，與上一屆以工程師為主的領導人相比，特別是與政治輔導員出身的領導人相比，在和基層百姓的語言溝通能力方面，新一屆領導人具有明顯優勢。

知青在文革中不能依次接受小學、中學、大學教育，在中學畢業後就進入了「社會大學」。在廟堂與江湖之間，「社會大學」屬於江湖，三教九流，黑白兩道都有。英雄豪傑，哥兒們義氣，隨機應變，蔑視成文規則，都屬於江湖的風氣。進入官場苦熬幾十年才登上高位的知青，江湖因素不會輕易流露，但偶然會有表現。

知青一代成年以後趕上了改革開放，經歷了對文革的反思，目睹了蘇聯模式的破產和冷戰的終結，參與了中國在經濟領域和世界接軌的過程，感受了民主憲政成為人類文明不可抗拒的潮流。時代要求他們必須與時俱進，吸收新的政治理念。「憲法的生命和權威在於實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中國共產黨要容得下尖銳批評」，這些語言具有普世性，與人類的政治文明是相容的，所以一經提出，便引起了輿論的善意期待。

到目前為止，當政者的語言屬於新舊交錯的混搭型格局，即在沿襲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上，適應內外不同場合，吸收毛澤東語言、基層群眾語言、普世語言乃至江湖語言。就眼前來說，這是擴大統治基礎的需要，是面向多元價值的格局的應對。至於今後向何方定型和發展，尚待繼續觀察。

四 關於知青的初始從政經驗

文革期間下鄉的上千萬知青中，擔任過農村基層幹部者雖然人數不多，卻值得我們單獨討論。

知青下鄉以後，說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實際上是受農村基層幹部的領導和管理。當時中國農村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隊為基礎」就是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共產黨的支部一般建立在生產大隊一級。大隊黨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都是一定範圍的當家人，掌握社員的命運。當時大隊黨支部書記、生產隊長和知青之間存在一種權力支配關係，在這種關係中，農村基層幹部利用職權傷害知青的現象多有發生。

知青通過奮鬥，脫穎而出，成為基層幹部，在當時並非易事。因為農村基層領導班子的配置權力掌握在上級黨委手中，雖然黨支部書記要履行黨員選舉的程序，生產隊長要履行社員選舉的程序，但往往流於形式，不能違背上級的意旨。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角色猶為特殊，既是在生產隊掙工分的人民公社社員，又是縣、社兩級黨委選拔和依賴的基層幹部，處在國家和農民二元結構的接口處。他們是國家統治農民的權力末梢，又是農民應對政府的利益代表，既要貫徹上級黨委的意旨，又要對治下農民的生計負責。上級要求多徵購糧食，農民希望多分配口糧，填飽肚子；上級要求農民全力投入農業生產，農民希望爭取一點小自由，搞一些副業，獲得現金收入。大隊黨支部書記往往要為平衡雙方利益去周旋。

當時大隊黨支部書記的榜樣是陳永貴。輿論極力讚揚大寨以國家利益為重，讓農民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其實大寨成為先進典型以後，得到的國家無償支援，遠非其他農村可比。在當時的環境下，知青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或生產隊長，往往都會調動人脈關係，向上級或外界爭取更多的生產生活資料，而不會滿足於簡單的上傳下達。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權力體驗，不是讓人更加信任規則，尊重秩序，而是讓人偏好謀略，注重權變。

到目前為止，當政者的語言屬於新舊交錯的混搭型格局，即在沿襲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上，適應內外不同場合，吸收毛澤東語言、基層群眾語言、普世語言乃至江湖語言。就眼前來說，這是擴大統治基礎的需要，是面向多元價值的格局的應對。

這一代知青出身的領導人，更多的經驗積累來自於改革開放以後的從政經歷。知青生涯不過是他們從政的前史或初步嘗試。知青時代的遺產，包含某些與現代文明相悖的因素；認真地加以清理，而不是盲目地讚美，仍然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

陳永貴作為毛澤東樹立的農村幹部典型，還體現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特色。陳主張「大批促大幹」，反對「老好人」，影響了當時農村幹部的從政風格。自從農村納入人民公社體制以後，農民的基本政治經濟權利都被剝奪了。幹部和農民的关系，本來就是前者支配後者，不受後者制約，加上頻繁的政治運動，又給了幹部整治群眾的機會和口實。樸實忠厚的農民，往往有如馴服的牛羊；而一些強勢的農村基層幹部，就成了說一不二的土皇帝。農村幹部和社員之間，通常並非詩意的「魚水」關係。知青在這種時代氛圍裏獲得的初始從政經驗，往往不是導向敬畏民權，而是趨向保持威權。人們在稱讚知青底層體驗的時候，這些負面的影響往往被忽略。

當然，這一代知青出身的領導人，更多的經驗積累來自於改革開放以後的從政經歷。知青生涯不過是他們從政的前史或初步嘗試。知青上山下鄉，作為一頁歷史，已經漸行漸遠。但它的遺產，還是會若隱若顯地通過具體的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現實和未來。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核心價值觀，這本身是可取的。但它沒有否定過去時代的價值觀。知青時代的遺產，包含某些與現代文明相悖的因素；認真地加以清理，而不是盲目地讚美，仍然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

註釋

- ① 秦曉鷹：〈中共新領導的「底層情結」〉，《瞭望中國》，總第188期（2012年12月5日），瞭望中國網，www.outlookchina.net/template/news_page.asp?id=5952。
- ② 姜維平：〈從習開始，中國進入知青時代〉（2012年11月15日），榮耀西安網，www.ixian.cn/read-htm-tid-505534.html。
- ③ 陳奎德：〈何處是「岸」？〉（2013年1月15日），獨立中文筆會，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301/Article_20130115221248.shtml。
- ④ 引自〈梁漱溟直言「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惹怒毛澤東〉（2008年9月23日），鳳凰網，http://finance.ifeng.com/news/history/jjsh/200809/0923_4467_799452.shtml。
- ⑤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808。
- ⑥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27。
- ⑦ 「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1973，4，25日。」參見毛澤東：〈給李慶霖的信〉，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49。
- ⑧ 參見蔡昉：〈真正的城市化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財經》，總第347期（2013年2月18日），財經網，<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3-02-18/112510633.html>。
- ⑨ 參見〈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2012年11月16日），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6/c1024-19596289.html>。

丁 東 獨立學者，現居北京。